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目 录

抗日战争中期老河口地区文化战线的斗争	刘乐扬 (1)
活跃在抗日战争前线的抗演四队.....	翁 村 (46)
《老河口保卫战》一文未尽事迹的补充	陈仕俊 (60)
对《我所知道的政治大队和儿童工作队》一文的几点补充	刘乐扬 (62)
抗日时期五战区国民党党团活动.....	鹿盛文 (66)
我所知道的有关五战区军粮问题	鹿盛文 杨学端 (72)
我在五战区情况及其它(姚雪垠同志谈话记录)	孙东海等整理 (78)
老河口福生樊庄始末.....	秦学贞 蒋鹏云 (80)
热爱国家慷慨解私囊——抗日期间吴佩之捐献飞机一架	吴克基 (85)
“八百壮士”中的老河口人.....	申楚英 (86)

依介卿团长与老河口中山公园·····	曹 璠 (89)
民间音乐家王直夫先生·····	余家冰 (92)
轶事拾零 (八则) ·····	李光华 (97)
战时青年训导团简况·····	徐建中 (105)
抗日前老河口棉花整顿的经过·····	吴克基 (110)
关于老河口主要土特产资料·····	市供销社志办 (111)
王王牌镰刀·····	涂德学 (128)

内部刊物

一九八六年四月

抗日战争中期

老河口地区的文化战线的斗争

刘 乐 扬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送请戴子腾同志校阅，由戴子腾同志作出必要的注释，附于各节之后。〕

- 一、南雁在严寒中北飞。我是怎样离开桂林的。
- 二、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虎口中度过险关。
- 三、整顿艺宣队，夺回童工队。
- 四、在“捉放”、翻车、轰炸、夹攻、肢解中苦斗。
- 五、《雷雨》，“查办”。别离。
- 六、无限寂寞游子心，拿起笔来战斗，土地问题论战。
- 七、全面批判五战区文化工作。剧协分会胎死腹中。
- 八、骷髅伴着我迈进严冬。同归于尽。
- 九、四幕剧“蠶”。艺术协会与《新女店主》。冲过日全蚀的黑影，走出鄂北荒原。

一、南雁在严寒中北飞。——我是怎样离开桂林的。

一九四〇年春节前夕，我经过两三千里的长途跋涉，由桂林到达老河口，踏进了又一个艰难的历程。

老河口地处汉江上游，位于光化县南郊，是鄂西北门户和豫鄂两省交通孔道。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此地之后，又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重镇，商货集散，贸易繁盛，各方人物来往频繁。第五战区自抗日开始即由桂系的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是桂系少壮派首脑，桂系势力在鄂北日益居于支配地位。

我远从桂林来到老河口，是经过党组织的考虑决定的。一九三九年，我在广西学生军第一团任大队指导员，先后在平乐、怀集、蒙山、宾阳等地活动。由于查获了一批第四国际的文件，发现一大队十中队黎瑞生等二人是托派分子，又在平乐城内破获一个托派据点，抓到一名女托派，我乘机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肃托运动。因而引起了桂系的严重不满。广西托派原是桂系的一个当权派别，托派首领王公度曾经是李宗仁手下的红人，身兼广西党政军要职。但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桂系几个握有兵权的将领与少壮派及其省特务机构合谋，一举逮捕了六、七百名王公度托派分子，并且迅速逼迫李宗仁处决了王公度（广西省党部常委、省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谢苍生（南宁军分校政治部主任）、陶保垣（柳州中学教务主任。一说陶为共产党员）等十多名大小托派头目。罪名是策划军事暴乱，阴谋夺取广西政

权。但是李宗仁不久就发觉上了当，错杀了一批效忠于他的反共能手，非常后悔，以后即不准再抓托派，有人提到王公度，他就要生气。桂系特务机关为了反共，也要利用托派。所以我搞的肃托运动便大犯忌讳。不到两周即被学生军政治部停止，随之而来的是打击和排斥。当学生军于一九三九年冬实行缩编时，由三个团改编为一个团，我在宾阳前线即被降为中队指导员，须往百色、龙州一带报到。此时南宁周围战事方酣，无法前进，被迫而辞职回到桂林。

我向十八集团军驻桂办事处、南方局负责人李克农同志回顾检查了一年的工作，要求重新安排任务，希望派到解放区去。克农同志肯定了肃托斗争是正确的，但是继续严密隐蔽下来，不再暴露，也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便已建立的桂系关系，不能抛弃或割断。要在这一前提下谋求公开的社会职业，继续深入桂系，从事情报活动。

然而我所认识的李宗仁、韦永成均在千里以外的老河口，李品仙的十一集团军总部也位于前线，少壮派骨干、桂系特务头子韦贇唐则早已对我有所怀疑，他并加入了军统，和康泽打得火热。许多桂系分子各奔前程，不少人投靠蒋帮，已没有抗战前那种互相支援、派系鲜明的“团体观念”。桂林失业者众，在桂系圈子里谋职业，已经不容易了。我和杜宇住在孟超的寓所，上一家馆子吃包饭。为了谋职，在桂林奔波了两个月，毫无结果。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规模遍及全国，第五战区桂系首脑也撕下了伪装的开明面具，将应邀到鄂北和立煌（金寨）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赶走，鄂北和皖北我党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

坏，许多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或被投入监牢，或被迫而转入解放区。第五战区一片白色恐怖，许多机关缺编减员，无人办事。李宗仁为此电令广西绥靖公署选派一批桂系干部到老河口与立煌听候任用。选派工作由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主持，我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到鄂北去深入了解桂系和第五战区的情况，同时作为一份力量，前去填充空白，起好作用。李克农同志考虑了我的意见，批准我去老河口，以便运用老牌桂系成员身份，继续贯彻“深入桂系，力求打入其核心”的活动方针，搜集情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李克农决定将我的组织关系通过重庆南方局或延安党中央转往鄂北，为此我交了自传和照片，约了暗号，以便鄂北地下组织派人找我。在没有转好关系以前，仍然和李克农同志通讯联系，其秘密收信地址是桂林新知书店转李种禾收。于是我托王深林向程思远提名，加入了北上干部队伍，于一九三九年底离开桂林。王深林是韦永成的留德同学，当时在广西绥署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秘书主任一类职务，政治上是“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重要成员。“第三党”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二、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虎口中度过险关。

我到达老河口的第二天，便在战区政治部见到韦永成。他对我依然印象良好，视为青年忠实桂系分子，是他们“团体”中的人，表示要我留在鄂北，不去立煌。我于一九三六年当李（宗仁）白（崇禧）尚在反蒋之际，在湖南率命打入

桂系地下组织，这种来自外省的青年桂系分子是少有的。当我在一九三七年春节因逃避中统的追捕而转移到桂林时，曾受到热烈欢迎，李品仙和韦永成代表李、白设宴招待过我和另一个来自湖南的桂系成员，将我安置在乐群社作为嘉宾款待。但自“七七”抗战以来，蒋桂关系重归于好，我既人微言轻，又受到了特务头子韦贻唐的怀疑，加之没有机会再与韦永成见面，以致几年来并未能深入桂系和受到上层重视。这一回再与韦永成相遇，似乎是个转机，情况应当有所改变。

我呆在一家旅馆里待命。几天后，得到战区政治部通知：委任我为政治部设计委员。又过了两天，通知我去韦永成公馆开会。

会场是韦公馆客厅旁的一间密室，到会的一共五人：韦永成、尹治（政治部秘书主任）、王林渡（设计委员）、一个高个子和我。经过介绍，才知道高个子叫庞郁生。所谓开会，不过由韦永成训话一通，宣布一项决定，并未讨论什么问题。韦永成讲的是新四军李先念支队深入大洪山，鄂北我地下党组织虽遭破坏，但仍在加紧活动。危言耸听，又忧心忡忡，接着说：“今后对付共产党的方针，仍然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军事，就是派出正规部队警戒大洪山，不让新四军渡过襄河（汉水），向鄂北和豫西南扩展。政治部主要负责“七分政治”，即用特务手段继续破坏我地下组织，逮捕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实行白色恐怖。谈到这里，韦永成端出了他的特务机构“五战区调查统计室”，说这个机构责任如何重大，使命如何神圣，可是过去所作所为“太不象话”，声言“必须彻底改组”。随即宣布撤销庞郁生的

调查统计室调查科长职务，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手令，任命我为调查科长。韦永成说：“你是‘六一’运动前后在湖南加入我们团体的忠实同志，懂政治，又纯洁，相信你能胜任愉快！”他命令庞郁生即日向我移交，便宣布散会。

韦永成的这一决定，对我是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突然袭击，有如巨雷盖顶，震得我又紧张又昏眩。他那一纸手令象千斤重闸压在我身上，我一言未发，拖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走在街上，一阵冰冷的雪花迎面扑来，使我猛然一惊，意识到眼前正面临着一场险恶的斗争和严重的考验，必须小心应付，不能玷污清白，掉进陷阱。

王林渡是名作家王统照的本家，王深林的堂兄弟，曾经写过一些号称进步的文章，我在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团时就认识了他。今天他出现在韦永成的秘密会议上，显然早已落水，成了特务头目。我必须从他身上入手，摸清情况，徐图对策。

这个曾经标榜清高，自命进步，并且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王林渡，首先对我坦白承认：他是为了不耐清苦，贪图享受，而出卖灵魂当了特务的。据说调查室的几个头头，除了固定薪水之外，每月还有数倍于薪金的办公费，还可以随时开支特别费，以及种种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他在老河口有名的七七饭店长期包用一个特大房间，每日好酒好肉，吃得十分惬意。自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就搭上了韦永成的关系，翌年曾到立煌视察特务工作，提出了详细报告，深得韦永成赏识。据他介绍，五战区调查统计室隶属政治部，既受桂系领导，又和军统有联系，平日由韦永成节制。调查统计室主任冯树是老牌桂系特务，当时因事去了重庆。主任

之下，设有组织、调查、总务三科。王林渡任组织科长，庞郁生任调查科长，总务科长梁伯樵兼任（三青团头目和老河口区长）。这个特务机关以三青团为掩护，同三青团一道设在黄州庙。专职特务分布于鄂北各县的约有七、八十名，也是以各地的三青团或县党部为掩护。调统室的这些特务分子一面疯狂反共，一面到处敲诈勒索，奸淫妇女，弄得天怒人怨。鄂北的商人、士绅纷纷向李宗仁、韦永成告状，韦不得不将庞郁生撤职。正当此时，我到了老河口，韦永成便按其大少爷作风，毫不犹豫地要我接替庞郁生。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按照我在桂系的活动方针，我应毫不犹豫地深入其核心机构，接受韦的任命。但是问题在于：我刚到老河口，不仅没有同鄂北党组织接上关系，连到岸信也没写给李克农同志（他必须在我立足已定的情况下，才能报请上级通知鄂北的党组织找我）。不仅得不到组织的批准，尤为严重的是得不到组织的领导。别的事情可以先斩后奏，可是担任特务机关科长这样的大事，就非经过组织批准和得到组织的密切的领导不可。否则就要丧失立场，玷辱清白，并且一事无成，客观上只能为敌人效力，其性质等于叛变。而时机紧迫，间不容发，是否接受韦永成的任命，必须立刻作出决定，然而拒绝任命，也非易事，第一要巧妙不露破绽，不引起怀疑；其次还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接上组织关系后，从新打进这个特务机关（毫无疑问会得到组织批准）。这真是一场不流血的特殊斗争。

庞郁生第二天陪我到调统室机关看了一下，问我什么时候搬进去。可是不交出工作线索和特务名单，不介绍鄂北情

况，而韦永成是命令他立即交移的。我觉察他是意存恋栈，便有意不谈接受移交问题。

为了拒绝韦永成的任命，我避而不与他见面。而是再一次找了王林渡，要他向韦转达我的意见。我说，对于鄂北，我人生地不熟，什么情况也没有掌握，调统室的七、八十名特务都为庞郁生所控制，我与他们没有任何渊源，必然指挥不灵。庞郁生没有立即移交，特别是不介绍鄂北情况和工作线索，是有意卡我，我如果强行接管，他很可能使党羽和我捣乱。那般人无非党棍团棍、流氓地痞，只会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没有本事和共产党斗争。我说：“如果韦主任坚持要我接替庞郁生，那就必须彻底改组调统室，遣散现有特务，另行招收一批较为纯洁的青年，加以训练使用。若不一律遣散，也要集中整训甄别，该淘汰的坚决淘汰。这些意见如不被采纳，我就不干。”于是我按兵不动，躲在旅馆里等消息。

韦永成和王林渡都反对一律遣散，认为重新招收人员，远水不救近火。他们采纳了集中整训，个别甄别的办法，重新叫庞郁生去工作。同时由政治部下令派我到直属艺术宣传队主持队务。韦永成并未收回他的手令，也没有说我不准插手调统室，这正好与我的愿望相符：既没有引起怀疑，又还留有余地。

两个月后，韦永成下令调统室的鄂北各县特务集中老河口整训，由王林渡负责。这批特务都住在黄州庙，有如开展览会一般，全部暴露在老河口群众眼里。王林渡给了我一本名册，要我担任个别谈话，另外讲一次《国际形势》，一次《如何调查》。这一回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因为他们

请我去调查那些特务，岂有不去之理！

可惜我缺乏经验，又不够沉着。我急于弄清特务们究竟掌握了多少关于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和材料，想从这些线索中找到党接上关系，并设法保护地下同志的安全。我发觉特务们谈的都是些捕风捉影、凭空猜测的废话，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所有地下党的线索，都从他们那里断掉了。这使我感到安慰，但是我的急躁而幼稚的盘问，引起了小特务们的怀疑，我对他们的蔑视与训斥，尤为招致反感，他们向王林渡作了汇报。王即借口战局紧急，要提前结束整训，把名册收了回去，同我个别谈话的特务还不到十个。老河口不久就遭到轰炸，战火逼近襄樊，这个特训班果然匆匆散摊，连调统室机关也撤走了。

枣宜会战结束后，我司调统室不再有任何关系。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对我开始了监视和调查。但是韦永成的手令并未收回去，在我手里居然成了一支鸡毛令箭，超过一些保护作用。甚至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在柳州《阵中日报》任主笔时，还用这个手令迷惑了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使之改变主意，撕掉了逮捕我的命令。通过老河口这场严峻的考验，我站稳了立场，保全了清白，未遭意外。然而这是一场险恶的经历。

三、整顿艺宣队，夺回童工队

五战区政治部派我到直属艺术宣传工作队主持队务的“日日令”下达之后，我就于一九四〇年元宵节前住进队部，以全力投入文艺工作。首先是整顿这支队伍。同时和驻

在老河口的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四队及朝鲜义勇第二队协同一致，通力合作，力求把鄂北的文化艺术宣传工作，沿着坚持抗战、进步与团结的方针，推向前进。

艺宣队原辖四个区队和一个儿童工作队。后者收容的都是八、九岁至十二、三岁的战地儿童。四个区队的成员主要来自滇川青年军团，大部分是青年军团鸡公山艺术训练班的学生。全队成份复杂，政治与思想斗争极为尖锐；虽然进步分子占有多数，但是缺少核心领导，没有团结起来。另外却有一小批坏蛋接受特务机关任务，勾结反动分子，专在队上侦察监视进步队员，破坏抗战工作，进行反共反苏活动，胡作非为，十分猖狂。

四个区队：一个主要演出话剧、歌咏；一个专演平剧（京剧）；一个从事文字、绘画、木刻宣传，同时参加话剧工作；一个专在战地与后方医院做宣慰工作，又称宣慰队（注①）。每队设区队长一名，平剧队还有一个聘来的专业教官。原来的主要负责人队附（队长历来由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兼任）和区队长全是反动军官，没有一个是懂文艺工作的内行。少校区队长韩一德是个兵痞出身、贩过鸦片、无恶不作的复兴社分子。宣慰队长赵玉贞是个极为凶恶的女特务。只有童工队长王庆沆、指导员王克平是从分队长中选出来的进步分子，但他们因此成了被打击迫害的对象，童工队成了反动派争存的目标。进步与反动势力常常围绕童工队的思想与工作问题展开斗争。

艺宣队长期由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复兴社骨干分子杨白楹兼任，他派了一个叫谭定的军官当队附，主持日常工作。这个姓谭的对内克扣军饷，侵吞公费，对外敲诈勒索，

形同绑匪；他率领艺宣队在宜昌、襄樊工作时，公然向商人诈索巨款，被商人告发。韦永成这才将其撤职，派我主持整顿这支队伍。我初去时，向韦永成要了从广西国防艺术社来的蔡方(原名蔡虹)担任第二区队长，主持话剧工作。正式任命了从分队长提拔上来的已经代理区队长的段世昭为第一区队长。指定平剧教官王庆禄(盖玉昆)主持第三区队业务，从而架空了韩一德，然后趁他偷窃公款被我查获的机会，将他撤职。杨白楹立即派郑培心来担任第三区队长，又在宣慰队拨归前线部队之后，将赵玉贞调回，直接派到童工队担任队长，把王庆沆、王克平赶回艺宣队。于是艺宣队所有反动分子都聚集到赵玉贞周围，他们经常在童工队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如何迫害进步队员，并且在童工队大吃大喝。赵玉贞对童工队的儿童威胁恐吓，甚至打骂，不准孩子们和艺宣队进步队员接近，动不动就骂他们是“小奸党”“二八路”。还在深夜带领特务到队上搜查进步刊物书报。赵玉贞在打了敢于反抗的九岁儿童赵继雷(吴惠明)之后，还狠狠地补上一句：

“有一天炮子总会崩了你这个小共匪”。孩子们纷纷向我哭诉，进步队员也要求我干预。我决定先将赵玉贞的气焰打下去，然后发动群众，全面整顿，我派人把赵玉贞叫来，质问她：“童工队建制在艺宣队，我是你的上官，你是我的部下，为什么不先来向我报到请示，就接管了童工队？你凭什么如此胆大包天，敢于藐视上官，目无法纪？”“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和后台，敢不敢亮给我看？”“这是李司令长官统辖的第五战区，童工队是五战区政治部的工作队伍，你说孩子们是‘小奸党’、‘二八路’，你是不是想要骂李司令长官？骂韦永成主任？你有什么证据，能不能拿出

来？”“你打骂儿童，是学日本人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学恶霸老财的封建专制？你三十多岁了，有没有儿女？你怎么不把别人的子女当人看待？”“你们在队上大吃大喝，密谋策划，究竟要干什么？”我这一派官腔，一连串质问，把赵玉贞吓得呆若木鸡，立正站着，无话可答。我又重重地补上一句：“如果你再专横霸道，胡作非为，不受节制，不听命令，我就随时撤掉你的职务，还要法办！”我告诉赵玉贞，今后不准限制儿童学习，不准打骂儿童，不准在队上大吃大喝。第二天，我就带了赵继雷等几个孩子去见李宗仁司令长官，经他当面批准发给童工队和艺宣队每人一套新衣，增加主副食标准。这对一般反动分子起了示威作用（注②）。这个队里有进步队员，如：程光锐、赵思温、袁梦云、王克平、王庆沆、戴子腾、张动民、陆致祥、赵世基、单善、徐效增等，有的是民先队员，但是缺乏进步的核心领导，没有把大家组织团结起来。过去由于负责人都是反动军官和复兴社小喽罗，使进步力量长期受到压制，工作不易开展。队上公费都饱了私囊，队员生活极其艰苦。许多有才干的青年苦闷悲观，都想另谋出路。少数特务分子不时捣乱、破坏，给进步力量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平剧区队本有一个很能演戏的教官，又有全套崭新的行头，已经训练出一批演员，但是一个个都沾染了旧艺人的坏习气，思想保守落后，生活腐化糜烂。那个教官又抽上了鸦片，还在外面包了个女人，落后分子都到他那里去鬼混。他们为了搞钱，还勾引一些人去赌博。总之，乌烟瘴气。

整顿的办法是：废除军事管理、个人专断、命令行事、盲目服从；树立进步的领导核心，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

开，订立合理的工作与生活制度，提倡自觉的组织纪律，定期举行以分队为单位的生活会议。我决定全队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生活委员会，负责掌握全队经费开支，办理伙食，管理一切后勤工作，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经济方面，队里的公费全部交生活委员会管理，不再由主管官掌握，废除节余款项归入私囊的恶例。一切帐目定期公布，由全体审查。实行工作补贴（从演出收入中开支）和贫病救济，委员会由推选出来的分队长和队员代表组成；我虽担任主委，只负责召集会议，提出议程，一切由讨论决定。另一个是工作委员会，由我和各区队长、部分分队长和几个队员代表组成，负责研究部署，领导全队工作，布置学习与业务讨论。两个委员会的成立，使人心大为振奋。尤其是生活委员会与经济公开，最受大家拥护。进步分子立即团结到我的周围，形成巩固的核心力量。那些反动家伙不敢再唱反调，从事捣乱。

部署既定，我们就积极展开了排演工作，分成五、六个剧组排练节目，为了改变平剧演员的思想作风，动员他们参加话剧区队的排演工作。进步分子和我也到平剧队参加排练和演出，并对平剧进行初步的改革。为了挽救王庆禄，我给他提工资级别，安排房间，帮助他戒掉鸦片。为了培养战区部队艺术工作人才，又经韦永成同意，由艺宣队负责主办训练班，调集战区各军师政工人员中的戏剧、美术、歌咏工作者一百余人齐集老河口，施以业务培训，并从中挑选了一些人留在艺宣队。经过两个月的整顿，队上风气为之一变，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生活纪律的自觉性均大为提高。我们一共排演了一个多幕话剧《魔窟》、五个独幕话剧（《人约黄昏》等），挖掘出一批过去从不为人注意、不排角色的优秀

演员，如赵世基、蒋鸿仪等。歌咏方面，排练了《生产大合唱》（配乐），重新整理提高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唱。平剧新排了两本大戏《荀灌娘》和《木兰从军》，加工整理了《捉放曹》、《坐宫》、《骂殿》、《斩经堂》、《卖人头》、《打渔杀家》、《法门寺》、《锁五龙》、《武家坡》等十多个常见的折子戏。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我们除了正式演出外，经常在队上举行文艺晚会，把所有的节目都拿出来彩排；然后再行加工。艺宣队驻地是火星庙，进深三间，庭院空旷，还有个戏台，演出十分方便。

正当我们精神奋发，安定前进的时候，顽固派环伺左右，侧目而视。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战火燃遍了襄河两岸。特务的迫害，敌机的轰炸，翻车，转进，一个一个不幸的事件接连发生。我们艰苦挣扎，从春节到阳历七月，历时半年，艺宣队的名子竟被取消，换上了一块新的招牌，名曰“政治大队”。这个名称并不是光彩的。

戴子腾注：①宣慰队的全名是“第五战区政治部宣传慰劳工作队”，它编制在艺宣队内，工作上则由第五战区政治部直接指挥。这个队的队员，都是老河口一带的知识青年，不是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艺术组的学生。

②关于童工队，当时进步力量和反动分子在争夺它。进步力量主要是先后任过童工队队长、指导员的王庆沅、王克平、戴子腾、张劲民、单善等，得到艺宣队一些进步队员的支持；反动分子主要是也曾任过童工队长、指导员的赵先让、金绍舜、赵玉贞等，受到杨白楹等的支持。围绕着童工队问题的斗争，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一场较量。刘乐杨同志主持艺宣队工作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方面，支持

了进步力量，打击了反动分子。

四、在“捉放”、翻车、轰炸、夹攻、肢解中苦斗。

赵玉贞遭到我的训斥之后，威风扫地。童工队的孩子们再也不怕她了。原童工队负责人王庆沆、王克平等仍然插手童工队的事务，给孩子们出主意。而王克平是个左倾幼稚病患者，他满口进步名词，不问对象，不讲策略。赵玉贞怀恨在心，串通赵先让、金绍舜向韦永成密告王庆沆、王克平是共产党员（其实尚未入党）。韦永成信以为真，也不向我打个招呼，就决定将他们逮捕。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八日黄昏，两名武装宪兵来到火星庙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纸韦永成的手令：“查王庆沆、王克平有共产党嫌疑，着即交宪兵押解来部，以凭究办。此令艺宣队张队附。”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大部分人都出去了。我问宪兵进来的时候看见什么人没有？他们说：“一个也没遇见。”我说：“好，你们就在办公室不要露面，以免走漏消息；我看能不能派人到街上去把他们找回来。”我走到第二进大院的一间工作室里，发现程光锐独自一个人在写什么，便将韦永成的手令给他看了，悄悄问他是否知道两王在什么地方，他点了点头，我一努嘴，一挥手，示意他立刻去通知两王逃走。他心领神会，闪电似的飞出了庙门。我回到办公室，告诉宪兵，已经派人去把队员们找回来，等一下集合，就可以把人带走。他们居然老老实实的一动也不动。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程光锐出现在窗户外面，朝着我点头微